

日本自民党派阀的有限适应性分析

——基于政党适应性的理论

郑小满 张晓磊

【内容摘要】 政党适应性，即政党组织应对环境挑战和进行内部调整的能力。这一能力若强，则可以通过政党改革、政党转型等方式实现政党存续，反之政党则会消亡。自民党党内派阀的影响力从20世纪90年代的顶峰跌落，与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联，自民党通过改革成功延续执政地位与派阀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但在考虑外部因素冲击的同时，派阀的组织动力和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成为派阀应对外部冲击的内生动力。因“黑金”丑闻拉开的派阀解散序幕，并不是这一特色制度的真正终曲。

【关键词】 日本政治 日本自民党 政党适应性 政治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章编号】 1003-4048(2024)02-0088-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24.02.007

【基金项目】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海洋军事战略调整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BGJ064);社科院创新工程“后岸田时代日本政治与政局变动研究”(项目编号:2024RBSB01);社科院培远计划“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对台海局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郑小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2488)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12月14日,虽内阁不信任案未获通过,但因卷入政治宴会“黑金”丑闻,岸田内阁的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总务大臣铃木淳司等人先后提出辞职。^[1]以上四人皆属于现被称为安倍派的清河政策研究会,^①再一次把派阀政治、金权丑闻、政治资金的非法筹集与不当使用等传统话题带入民众视线。这次风波直接导致了日本自民党

多个派阀解散。2024年1月23日,岸田文雄首相担任会长的宏池政策研究会在东京永田町的事务所宣布正式解散。^[2]党内的安倍派、森山派、二阶派先后均提出解散,自民党党内的六大派阀已解散四个,余麻生派和茂木派还在支撑。

虽然岸田文雄以解散本人所在派阀展示改革党内派阀政治的决心,但民众并不能迅速恢复对岸田内阁的政治信任。根据《朝日新闻》的全国舆论调查(电话)结果显示,对于“若党内派阀解散是否有助于恢复政治信赖”这一问题,72%

^① 以安倍派和清河政策研究会两个名字为例,“清河政策研究会”是党内派阀的正式名称,除非正式更名否则不会更改。“安倍派”是以派阀现领导人命名的简称,因此“XX派”的称呼会随着派阀领导人的变化而变。

的回答认为“没有”，仅有19%认为“有”。即使是在自民党的支持层，也依然有62%的支持者认为“没有助于”，仅有24%认为“有助于”，落差较大。^[3]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一直以来受到强烈批评，这也不是自民党历史上第一次解散派阀，但派阀依然延续至今。

日本“五五年体制”形成后，自民党处于“一党优位”的强势地位，使首相指名选举逐渐内化成自民党总裁选举，催生激烈的派阀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的结构及功能的角度出发，派阀出现了“模拟政党化”的现象。在组织架构上，自民党和党内派阀均采用阶层制度，都是纵向的上下关系，设置首长、干事长、总务会长等职务，且大多数组织的名称大同小异。相互对应的各个职务和机构的职能基本相同，而且二者机构的设置均对应于内阁的职能部门。从组织功能上看，二者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交换信息、政治陈情、募集与分配政治资金、分配人事职位方面，自民党派阀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政党的职能。^[4]

自民党派阀制度化、社会化的特点使自民党内派阀与其他国家政党内部的派别或利益集团区分开来，甚至被称为“党中党”。1993年的政治改革后，自民党派阀的生命力受到了严重打击，21世纪初期也出现“派阀即将消失”的声音。但即使离巅峰时期具有差距，派阀仍在现在的日本政治中，尤其是在国会议员选举和首相选举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先前所述的派阀“模拟政党化”现象，本论将借用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ation）理论，将自民党的适应性改革的与党内派阀进行比较，分析自民党派阀为何虽“模拟政党化”但不能像政党一样主动寻求适应改变，以及自民党派阀为何经受打击却又“死而不僵”。

二、文献回顾

关于自民党的改革和党内派阀的变迁过程已有多位学者发表过著作论述。藪野祐三以自民党政权为中心阐述了日本政治的运行规则。^[5]北冈伸一认为自民党的派阀是基于中选举区制度、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政策、意识形态的差距以及议会

内阁制等现实合理应对发展而来的产物，^[6]详细阐释了自民党自成立至“五五年体制”崩坏后党内权力斗争与变迁的过程。^[7]

杰拉尔德·柯蒂斯（Gerald L. Curtis）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切入点，认为日本的变革是一个漫长且充满阻力的过程，日本社会和政治机构对激烈变革的抵制根深蒂固。即使政治家提出改革口号，但他们所奉行的政治原则极其谨慎，总是远远达不到形势的要求。对当下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愈来愈深的焦虑撕扯着日本政治的变革之路。^[8]

政党适应性理论与政党转型、政党改革等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在政党组织学的领域中，政党适应性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它是政党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内生的改进动力都促使政党开展适应性改革。杨光斌指出：“适应性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衡量政党政治制度化、完备性的标准之一。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政党在与外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其适应性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整。”^[9]

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的组织发展理论认为，组织如果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完成两项具有关联性的任务。其一，组织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组织的外适应；其二，组织能够协调内部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也就是组织的内适应。^[10]从这两项任务出发，政党进行转型或改革的动力则被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部分。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组织变化会在外部刺激（环境挑战等）和内部因素（权力结构改变等）的合力刺激下产生。

安杰洛·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认为讨论政党变化时应对组织变化进行严格定义，即改变组织权威结构（即组织次序）的根本性变化。简述组织次序的变化，即外部刺激引发了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党内主导联盟的更替必然通过改革获取合法性。^[11]进一步将影响政党适应性改革的外部因素进行归类，艾伦·维尔（Alan Ware）将政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重大变化）归

因于：政治制度的更迭、选民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分歧、政治价值观和社会议题的变化。^[12]

在所有外部因素中，选举被认为是直接导致政党改革的最重要因素。沃林茨（Steven B. Wolinetz）假设：若政党是一个适应性组织，则会根据选民的需要来调整他们的诉求。通过英国保守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案例，推测一些政党之所以能获得支持正是因为它们善于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说仍具有定义和解释议题的能力。^[13]

在长期的“环境主义”研究发展后，许多学者开始强调政党内部因素的重要性。哈默尔和琼达（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主张政党变革在原则上是领袖变动、党内主导集团的变化以及外部刺激的结果，要成功改变政党需要充分的理由（经常需要考虑环境的变化）和建立支持联盟。从政党是保守组织这一性质出发，一种刺激必须得到党内某个人的注意，才会开始重新评估政党效率并提出方案，外部刺激只有在直接影响到政党的首要目标时才成为一种“冲击”，才可能弱化政党的保守属性。^[14]这强调了政党领袖对改革的重要性，领袖必须看到“冲击”的重要性，并带领政党克服保守的惰性实现转型。

以自民党为对象的政党适应性改革研究中，王鹏飞论述了为完成“内适应”的党内改革，自民党在适应过程中经历了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卡特尔型政党演进的三个阶段。^[15]曲静从政治理念、组织架构、政策决定过程和选举对策四个方面分析了自民党为维持“一强”政党地位所进行的适应性改革。^[16]孟睿洽梳理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演变及特征，派阀的基因来源于日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17]干保柱、刘笑非分析了总裁公选制、中选举区制和传统政治风土如何促进了派阀的增殖与固化，认为自民党派阀的模拟政党化实现了“五五年体制”下国家政权在自民党派阀之间的轮替，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自民党的长期政权。^[18]国内关于自民党进行适应性改革的文章已较为充分，为本文借用政党适应性改革的推动因素对党内派阀进行分析提供了良

好的文献支持。

三、自民党派阀的有限适应性——与政党适应性的对比

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仅在1993年和2009年大选失利，成为在野党。1993年自民党大败终结了日本政坛长久以来的“五五年体制”，也直接拉开了自民党党内改革的序幕。为应对危机开启的改革帮助政党渐渐摆脱败选的阴云，派阀也由此开始盛极转衰。

自民党党内派阀由来已久，以岸信介时代的“八大师团”为标志，自民党党内派阀格局基本形成。^①与自民党相伴相生的派阀同属广义上的组织，甚至拥有与党组织结构相同的内部结构，却屡次陷入解散危机。1979年，福田赳夫领导“党风革新运动”呼吁解散派阀，后又有海部俊树、小泉纯一郎等人将解散派阀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派阀无法像自民党一般在面临危机时通过适应性改革延续存在，但在风波过后依旧能“复活”，本质上反映出自民党党内派阀陷入了存在危机：对政党保持优势地位的客观贡献和无法回应外部挑战的落后机制。

派阀的存在危机暴露出其进行适应性改革的能力有限，本部分将结合政党适应性理论中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以自民党面临的外部挑战作为具体案例，旨在说明当面临相同外部冲击时，要求派阀改革与自民党改革究竟存在什么底层逻辑矛盾，以及派阀如何通过改革外的什么方法进行延续。

（一）理论框架

政党适应性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视角，从“外适应”的角度出发，选举失败往往是一个政党发起适应性改革的直接诱因。艾伦·韦尔（Alan Ware）认为，推动政党转型的外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

1. 政治制度的改变：主要发生在政权的瓦解或重建时政治游戏规则的改变；
2. 选民结构的改变：有三种变化方式，一为

^① 若按合并前的自由党和民主党进行派别划分，民主党系列包括岸信介派、河野一郎派、三木武夫派和石桥湛山派；自由党系列包括池田勇人派、佐藤荣作派、大野伴睦派和石井光次郎派。

选民的转移，二为国家领土的改变，三为世代的交替；

3. 社会分歧、政治价值观和社会议题的变化：旧分歧的弱化促使政党寻找新的支持群体；新分歧的出现可能分裂出新的政党；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分歧中，政党领袖通过设定分歧议程的能力追寻权力，保证政党存续。

基于韦尔的理论，自民党和派阀迫切需要适应性改革的直接诱因，正是1993年的选举大败和政治制度改变。此处政治制度的改变具体表现为日本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的改变。1993年以前，日本众议院采取中选举区制度，1994年政治改革后变更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度。政治改革的本意是突破自民党“一强”政党的局面，实施两党制，摆脱“五五年体制”的阴影。但政治改革促使了原本处于“保革对立”状态的自民党和社会党的靠近，日本的政党体系从自民党和社会党的“保革对立”，转变为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势力的对立。

关于政党的“内适应”，哈默尔和琼达认为，政党变革在原则上是领袖变动、党内主导集团变化以及外部刺激的结果。^[19]其中领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1993年8月，自民党在众议院败选后，时任党总裁河野洋平组建党改革本部，开启党内改革，之后又经历小泉纯一郎的“小泉改革”，继续加强总裁和党本部集权。

仅从自民党短暂的两次下野后迅速重回执政中心的结果来看，它的适应性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自民党派阀作为自民党的党内组织，即使具有“模拟政党化”的特征，在改变外部因素方面并不如政党有力。小选举区制度的导入对自民党和党内派阀皆是重大挑战，党内改革在为自民党适应新选举制度变化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在杀死派阀的生命力。自民党派阀适应性的有限本质上来源于派阀利益和政党整体利益的矛盾和统一。不过，正如自民党总裁实行党内改革，派阀领袖也在寻找新的集结动力维护派阀的生存和壮大，且作为派阀集结底色的集团性文化并没有消失，继续为派阀的存在提供行动逻辑。

（二）外部刺激：日本选举制度改革

1955年，面临社会党力量的快速发展和日益

高涨的工人运动，当时日本的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选择合并共同对抗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由此日本政界开始了长期“保革对立”背景下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但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这一行为，就为派阀的诞生和发展埋下了种子。

日本的首选选举制度并非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各党派提名人选由国会投票选举产生。在国会众议院拥有过半数席位的党派可获单独组阁权力，该党派领导人即为内阁总理大臣。在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自民党总裁作为党首自然而然成为首相。因此，将首相提名选举内化为自民党党内派阀争夺党总裁一职的前提是，自民党始终保持国会多数席位。这一前提的实现离不开党内派阀的贡献，使派阀固化并增殖。

日本1993年前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是将全国分为129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3—5名议员，席位总数从1950年采取“公职选举法”开始的466席增至1992年的511席。

1993年，以原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脱党后，联合其他改革派推翻“五五年体制”，在野党联合成立新政府。1994年1月29日，日本众参两院通过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分别为《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及《众议院选区划定审议会设置法案》，正式导入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度，小选举区制度下全国共划300选区，每区选出1名议员，得票最多且得票数占总票数六分之一以上的候选人当选。比例代表选区共11选区，采取名簿式比例代表制。按人口比例分配当选名额，政党先按候选人的顺序位次提交候选人名簿，选举人以政党名投票，最后以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数量。众议院席位削减至500席，之后经多次削减至现在的465席。

这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推动者小泽一郎是如何构想的？小泽一郎在自己1993年出版的著作《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在快速变化的新时代，日本必须改变“三流政治”的现状，进行政治变革，从确立政治领导、地方分权和废除限制三个方面确立真正的民主主义。“中选举区制度使以社会

党为首的在野党变得无用了，结果，自民党半永久的政权持续着，自民党自身也陷于闭塞的状态。……使制度永远持续着，就是放弃政治的作用。”^[20]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场为了让国家适应冷战后新时代掀起的改革，自民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各派阀领导人作为长期实际国家领导人争夺者，必须从以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退场。

在原有的中选举区制下，自民党通常在同一选举区提名与议员定额大体相当的多名候选人。候选人要成功当选，首先是要获得党的提名，其次是要与其他党派候选人竞争的同时与本党的候选人竞争。^[21]日本选举有三大“神器”：“招牌”“钱包”和“地盘”，即候选人的声望、资金支持和票仓。某种程度上，资金支持是最重要的能力，所以往往党内的最大派阀也是筹集政治资金能力最强的派阀。尤其对于刚刚踏入政界的新人来说，即使在自己的家乡展开竞选活动，也需要党内的前辈帮忙进行演讲声援和派阀的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基本都会选择与派阀合作，获得派阀的资金支持和声援。

在新选举制度下，每名议员获胜当选所需选票也多于中选举区制度时的要求，派阀无法覆盖到所有选举区，以往派阀当选议员所依靠的稳固的地盘、强大的个人后援会不足以支持整个党的多数席位。加之《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明确禁止企业与行业团体对政治家个人的政治捐款，增加了派阀筹措政治资金的难度，削弱了派阀向地方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的能力。^[22]这种外部因素的冲击是派阀作为自民党内部组织无法改变的领域，因此从本次政治改革起，派阀整体发展已经走向下坡路。自民党为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和民众信任，以开启党内改革的方式适应新选举制度，派阀作为因政党存在而存在的组织，即使在党内改革中进一步被削弱，也不能提出异议。

（三）直接冲击：自民党党内改革

面对选举制度改革和失去多数席位的双重打

击，时任党总裁河野洋平设立党改革本部，开启党内改革。1994年8月26日，党改革本部发布《关于党运营、机构等基本问题的报告》，在前言宣称：伴随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往自民党由各个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建立的党组织必须进行根本变革，蜕变为真正的组织型政党，主要内容为：（1）解散派阀与强化党的机能；（2）制定新的理念；（3）转型为清廉的近代政党；（4）整顿政策决定体系；（5）整顿党机关的机能。^[23]

由此，原本被戏称为“派阀联合政党”的自民党必须加强党本部的建设，将原本松散的政党组织联系紧密起来，但党内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改革中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虽然选举的失败推进了自民党改革，但在新选举制度实施后的第一次大选即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时任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作为战后新一代代表政治家颇具人气，带领自民党重夺政权。这次胜选原因较为复杂，但不论原因如何，原本设计的改革目标尚未实现。在胜选后，原本定下的党内改革暂缓执行，派阀没有得到有效清除。这反映出政党具有保持现状的惰性，没有外部因素的刺激，难以仅凭内部因素做出改革。因此，重新唤醒改革的只能是下一次危机。

2001年4月，因“密室政治”而饱受诟病的森喜朗下台，因为他的屡次失言导致执政危机，内阁支持率降至冰点。^①小泉纯一郎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提出了“打倒旧自民党”的口号，高调提出以“邮政民营化”为核心的改革政策，以“政策本位”博得选民支持。首先，小泉在党内无视派阀大力提拔年轻议员、女性议员及民间人士，其中就包括了未来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其次，开启选举的“宣传革命”，把重心放在电视广告上，投入大量的经费在如邮政民营化法案等党的政策宣传上，以便在选民中积累人气。第三，将最重要的两项人事权收回党本部，一是内阁人事任命权力，二是公募候选人选举活动的主导权。前者原是经过派阀平衡决定，现在首相可以更自

^① 内阁官方长官青木干雄、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中广务、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参议院议会长村上正邦五人未经过党内总裁公选，单独商议指名接替小渊惠三首相及党总裁的人选。比如“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可以在第三国解决”等没有政治常识的发言。

由地任命阁僚。后者在小选举区制度中尤为重要。因为每个选区只能当选一名议员，自民党不能再像实施中选举区制度时推出多名党内候选人，政党全力支持一名候选人的当选可能性最大。所以若候选人没有得到党本部公认，将不能获得党本部的竞选资金。公认权集中到自民党党本部，削弱了派阀在地方选举中的影响力。最终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为标志，这场以总裁和党本部集权为目标的“小泉改革”宣告成功。

自民党的党内改革因保持执政党地位而存在并推动，最终以“小泉改革”为标志，派阀势力降至最低点。党内改革是因外部因素冲击而出现的政党与派阀间冲突的最直接对决，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最后由小泉纯一郎完成了总裁和党本部集权。因为政治资金规范及选举区变化，派阀丧失了提出异议的立足点。在将近四十年帮助自民党维护“一强”政党地位后，旧时代的派阀因面临外部环境的剧变而面临被抛弃的危险。

（四）内部因素：派阀组织动力不定

派阀政治是日本政治中独特的运行模式，从1956年自民党内第一次总裁选举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史称“八大师团”的党内八大派阀。这些派阀经过演进，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更名易帜延续至今。虽然个别派阀可以像自民党维持“一强”政党一样保持“第一大派阀”地位，但从派阀的历史上看，这仅是一种维持在一段时间内的个别现象。

《读卖新闻》报社总裁渡边恒雄曾评价，所谓派阀就是具有强大资金实力的组织和瞄准首相、党总裁之位的人们的结社，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因理念而成立的集团。自民党出现过两个成员人数过百的大型派阀，一是田中角荣领导的宏池会，二是安倍晋三领导的清和会。前者是筹集资金能力强、财力雄厚的大派阀，最盛期有140名成员，堪比当时最大在野党社会党的席位总数。后者则是以右翼政治家的姿态赢得了大量保守派和右翼议员的支持，顺应了日本政治在社会党等革新势力消失后政治右倾化的潮流。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原本拥有广泛党员基础的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萎缩，日本政治逐渐转为保守对保守的保守势力对决，日

本学者中野晃一在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特点时指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本质实际上是新右翼转换，即原有的右翼并没有发展壮大，而是出现了新右翼。^[24]新右翼在政治上体现为实现“普通国家”的理念，经济上体现为采取新自由主义。成为“普通国家”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打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小泉内阁时期借助国际社会呼吁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解禁自卫队海外派兵；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又借助承担盟友责任一说，解禁了集体自卫权。2022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新安保三文件，解禁作为自卫权行使方式的反击能力。虽然自民党把修改宪法作为本党党纲，但真正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议员和民众都只是少数，所以不断通过宪法修正案达到实际破坏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经济政策方面，政府要实现“简政放权”，包括多种事业民营化、特殊法人改革、中央省厅改革等。即通过规制缓和和地方分权实现建立“小政府”的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不仅与自民党分享权力的官僚体系得到整顿，经济界对政治的影响也日渐降低，首相官邸在经济政策上掌握了更多的决定权。^[25]安倍第二次上台组阁，提出了以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为中心的“安倍经济学”，进一步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施政方针。

抓住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安倍晋三所出身的清和会渐渐成为超越派阀存在的右派议员集合地，派阀的组织动力从资金转变为理念和主张。当传统的派阀“金权政治”饱受诟病时，提出新的主张能赢得反对者的支持。但是这种为了反对某一势力而集结的组织会演变成一股新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为了打倒派阀产生了新的派阀”。安倍晋三领导的派阀清和会，前身可追溯至福田赳夫的“党风革新运动”，主张取消所有派阀，从统一的政党出发考虑行动，可以说“打倒派阀势力”是这一派阀的底色。但是安倍晋三依靠“超越派阀”的意识形态吸引了更多支持，并借助长期连任党总裁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壮大了作为“总裁派阀”的清和会。但这个庞大的派阀却没有像安倍晋三一样有能力维持的继任者，安倍晋三去世后，清和会面临分裂危机，最终在丑闻下宣布解散。

（五）基因：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底色

就在安倍派解散当天的党本部记者会上，原自民党总务会长福田达夫表示：“在反省的基础上成立新集团很重要，”并申明集团“不是派阀而是新的治理形式。”^[26]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网上“认真的吗？”“伪装解散”的声讨。在民众心里，解散派阀成为一种公关手段，无法真正落实。在政治家的心里，派阀的意识也被根植，如福田达夫所说的“集团”，依然是与派阀无本质区别的组织。无论是在自民党的党史上，还是在更广泛的日本国民心中，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过着一种属于集团的生活。

集团主义脱胎于“村社会”这一概念，原指基于村落形成的地方社会，特别是以有权势者为中心、严格维持秩序、遵守传统、不愿接纳外来者的排他性社会，后引申为聚集同类人建立等级制度、听从站在顶点者的指示或判断行事并进行利益分配的闭塞性组织或社会。在村的内部，对违反村规的人有着名为“村八分”的惩罚，这是一种实施孤独、隔离于村社会的惩罚方式。在思维方式上，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一集团的一员。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我”是以社会群体方式体现的，个人应该属于某一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27]近代以来，日本政治中所出现的藩阀、军部、政党再到现在的派阀都是以集团形式存在，集团主义已经深深嵌入日本的政治文化。

在自民党的发展过程中，集团的作用被格外重视。首先是1955年左右社会党统一的危机感，让原本赢得大选的民主党（未过半数议席）选择与自民党合并，成立自民党。而后，自民党为了地方选举和更稳定的执政，从1993年开始与公明党组成执政联盟。集团意味着强大、稳定和大多数，新任议员在派阀中寻求支持与庇护，竞争首相位置的政治家在派阀中培养自身势力。自民党的党内结构接近没有底边的三角结构（图1），集团使纵式结构上下的成员均获得了收益，但也让集团合并变得困难。

在典型的纵式集团结构下，解散派阀或取消派阀相当于把横向的各集团合并。在没有纵向线

条联结两个集团的场合，每一个集团都最大限度地强调各自集团的利益，在磋商中，调整完全不起作用。而各方的代表或领导人之所以难以站在客观的立场把自己集团的利益多少作些让步加以调整，也在于他们在结构上容易受到其他成员的压力所致。^[28]毕竟各派阀的组织目标存在根本矛盾，即都希望本派阀领导人成为总裁、当选首相，本派阀成为党内主流派阀。只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依然稳固，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的位置依然相关，同一党内的领导人竞争者就会集结势力，形成派阀，并很难进行所谓解散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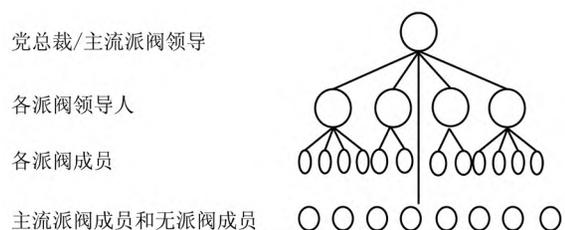


图1 自民党内集团结构

资料来源：中根千枝.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四、结论

自民党和党内派阀的关系以1993年政治改革为界，分为了两个周期。1993年政治改革前，中选举区制度下的派阀政治和自民党整体构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两者皆处于互补的既得利益者地位，有关适应性的思考集中在党内不满派阀存在的少数人。但1993年政治改革后，自民党和党内派阀都处于失势者地位，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改革削弱了派阀的党内权力来源，但却利于自民党开启党内改革，从原本的“派阀联合政党”改革为以总裁和党本部为中心。虽然派阀可以通过转变组织动力改善自身形象，但长期的削弱让大型派阀在失去有力领导人后无以为继。派阀适应力的有限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作为政党组织的下属组织，即使出现“模拟政党化”现象，也必须优先整体组织的发展和利益。

从派阀和政党的适应性改革来看，内部因素的动力远不如外部因素带来的冲击强烈。适应性改革的内外因素需要整合看待，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强烈打击，以往出现在内部的改革声音便得

不到放大和回应；若没有政党领袖的制度设计，内部改革也不会取得成功。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实，一是政党确实具有和其他组织相似的拒绝变革的惰性，不遭遇危机则难以克服惰性；二是米歇尔斯认为的民主政党最后必将走向寡头化得到验证。成功实现党总裁和党本部集权的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政治强人，他们在实施改革的同时巩固并发展了自身所处的派阀。

从派阀的角度来看，除了在危急关头以政党利益为先以外，本身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目前自民党内具有竞争党总裁位置的政治家基本都有自己所属的派阀，虽然派阀的生命力受到制度变革的无差别打击，但因为党内权力向党总裁和党本部集中，若党总裁出自本派阀，即所谓“总裁派阀”，亦可得到发展和资源的机会。诞生派阀的文化基因——集团性基因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只是通过各种改革美化了表面环境。从资金能力转向“右倾化”认同，也是一种寻求集团性认同的手段。

因此，在明确派阀政治是日本政治不成熟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根深蒂固的里层系统组织只通过解散是不可能快速消失的。派阀的式微是长期的发展趋势，但不能把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作短期的结果，派阀作为日本政治的特殊组织形式，依然会以各种名目继续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 [1] 朝日新聞. 安倍派4閣僚が辞表 松野氏『国政に遲滞を生じさせないよう考えた』[OL].(2023-12-14)[2024-02-01].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RDG36VORDGULFA005.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 [2] 朝日新聞. 岸田派、正式解散 活動には含み 絆大事に／集まり禁じられてない[OL].(2024-01-24)[2024-02-01].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846090.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 [3] 朝日新聞. 派閥は本当に解散できる？過去の調査を振り返ると…[OL].(2024-02-16)[2024-02-18].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2J3TRHS1YUZPS001.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 [4] 干保柱,刘笑非.“五五年体制”下日本自民党派

阀的兴起、发展及模拟政党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1):129.

[5] 藪野祐三.現代日本政治講義：自民党政権を中心として[M].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19年.

[6] 北岡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と権力[M].東京：有斐閣,2011年.

[7] 北岡伸一.自民党：政権党の38年[M].東京：読売新聞社,1995年.

[8] Gerald L. Curtis,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9] 杨光斌.制度的形成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0.

[10] 刘杰.政治学理论前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14.

[11] Panebianco Angel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43-245.

[12] Alan War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217-231.

[13] Steven B. Wolinetz,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J/OL].[2024-05-01].https://api.pageplace.de/preview/DT0400.9781000928532_A46896742/preview-9781000928532_A46896742.pdf.

[14] Robert Harmel,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 6(03):261-262.

[15] 王鹏飞.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J].日本问题研究,2018(3):25-34.

[16] 曲静.日本自民党的适应性改革及其“一强”政党地位的确立[J].东北亚学刊,2019(3):80-93+149.

[17] 孟睿洽.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演变及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8] 干保柱,刘笑非.“五五年体制”下日本自民党派阀的兴起、发展及模拟政党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01):123-131.

[19] 罗伯特·哈默尔,肯尼斯·琼达.一种政党理论：政党目标和政党变革的整合[M]//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23.

[20]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M].冯正虎,王少普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39-41.

[21] 干保柱,刘笑非.“五五年体制”下日本自民党派阀的兴起、发展及模拟政党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义 .2017(1):126-127.

[22] 王鹏飞. 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J]. 日本问题研究 .2018(3):31.

[23] 王鹏飞. 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J]. 日本问题研究 .2018(3):29.

[24] 中野晃一. 右傾化する日本政治 [M]. 東京: 岩波書店, 2015:3.

[25] 曲静. 日本自民党的适应性改革及其“一强”政党地位的确立 [J]. 东北亚学刊 .2019(3):83.

[26] Yahoo! Japan ニュース. 福田達夫氏「新しい集

団つくる」安倍派源流創設者の孫 [OL].(2024-01-19)[2024-05-14].<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8f7d535fae0cfb46f6f393dc3eacd3de19015dd9>.

[27] 张健, 王金林. 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481.

[28] 中根千枝.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M]. 陈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94:69.

(责任编辑 许悦雷)

A Finit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LDP Factions in Japan: Theory based on the adap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Zheng Xiaoman Zhang Xiaolei

Abstract: Party adaptability refers to a party organization's capacity to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make internal adjustments. Strong adaptability enables party survival through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while weak adaptability leads to party extinction. The influence of factions withi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has declined from its peak in the 1990s, closely linked to reforms in political and electoral systems. The stark contrast between the LDP's successful continuation in power through reforms and the decline of factions is notable. While external factors have had significant impact,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llectivist political culture serve as endogenous drivers in responding to external shocks. The sequence of faction dissolutions triggered by "black money" scandals does not mark the true end of this distinctive institutional feature.

Key Words: Japanese Politic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日本自民党派閥の限られた適応性分析 ——政党適応性理論に基づて——

鄭小滿 張曉磊

要旨: 政党適応性とは、政党組織が環境の挑戦に対応しながら、内部の調整を行う能力のことである。この能力が強ければ、政党改革や政党の転換などを通じて、政党の存続を実現できるが、逆にこの能力は弱ければ、政党は消滅する。自民党内の派閥の影響力は1990年代の頂点から急落したが、これは政治制度や選挙制度の改革と深い関係がある。自民党は改革を通じて、政権を成功裏に維持したが、派閥の衰退と明らかに対照している。しかし、外部要素の衝撃を考慮する一方で、派閥の組織力と集団主義の政治文化は派閥が外部の衝撃に対応する内発的原動力となる。「黒金」スキャンダルによって派閥解体の序章が開かれたが、これは当制度の真の終焉で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キーワード: 日本政治, 日本自民党, 政党適応性, 政治制度改革